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省征集办关于一九三〇年满洲省委遭受大破坏情况的专题报告和附件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一九三〇年 月 日起至一九八四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卷 内 目 录

順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張號	备 考
1	辽吉黑 征集办	关于一九三〇年满洲省委 遭受大破坏情况的专题报告		1984. 8.10.	1	
2	刘若云 (碧云)	关于一九三〇年前后满洲省委的情况			24	
3	满洲 党团部	满洲省委、同满洲省委 对于“五·一”工作的决议		1930. 4.5.	36	
4	丁基石	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		1982. 12.7.	39	
5	郭隆真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报告		1930. 5.17.	68	
6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共满洲省委 被破坏事件的回忆			91	
7	卢广绩	关于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 外交协会开会的情况		1983. 6.3.	118	
8	张光奇	回忆一九三〇年 国民外交协会一次会议的中断		1983. 7.3.	125	
9	米焕升	关于国民外交协会的点滴回忆		1983. 6.6.	129	
10	廖如愿	如愿关于鞍破坏经过 及目前情况给中央报告		1930. 5.9.	135	

卷 内 目 录

順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張號	备 考
11	滿洲省委	滿洲省临委给中央报告 ～关于省委破坏的原因经过 及所得到的教训		1930. 5.23.	139	
12	《盛京时报》	《盛京时报》对一九三〇年 我地下党遭到大破坏的报道		1930. 4.24.	147	
13		共党阴谋案株连横决 竟波及外蒙协会青年干部亦被逮捕		1930. 4.25.	149	
14		东北宪兵第一大队长杨洪基率宪兵 捕共犯刘文治等五名； 三省之首领丁君言，将印刷机器在沈阳中制售		1930. 5.1.	150	
15		① 反帝党狱 方兴未艾。 ② 前魁殆将正法		① 1930. 4.27 ② 1930. 4.29	151	
16		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署来电		民国廿九年 四月二十一日	152	
17		中共滿洲省委给中央报告		1930. 4.27.	153	
18		哈埠反帝党周一粟·戴芸洲 经审讯供出有种种连带关系		1930. 5.14.	166	
19		在哈埠捕获反帝党员董某等三人。 搜出证据甚多		1930. 5.17.	166	
20	滿洲省	滿洲临委致中央信 党中央至南，干部被捕，组织临时省委 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要求中央速派人前来领导。		1930. 4.24.	167	

关于一九三〇年满洲省委遭受 大破坏情况的专题报告

一九三〇年三月末，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离任赴上海，满洲省委的工作暂由团省委书记饶漱石代理。随即，中共中央任命李子芬（化名刘树清）为满洲省委书记，并任命邱九（邱旭明）为中央巡视员协助李子芬工作。（见附件1、29）

一、事件的缘起

四月初，李子芬主持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讨论省委的工作。这次会议突出强调在党内反对“右倾”，号召一切同志坚决反对“关外除外主义”。当时，满洲省委有的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关于“五·一”全国示威的策略有异议，他们认为东北党的工作，群众组织基础薄弱，又缺乏斗争经验，斗争方式应当与关内有所区别，因此，被斥之为“关外除外主义”。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关于‘五一’工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五一’全国总示威的运动，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坚决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尤其是在满洲的产业与政治中心如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等处，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其他在我们与群众组织比较有基础的农村如台安、延吉、柳河等处，同样应当坚决举行广大群众的示威”。“在工厂作坊中举行群众集会与飞行集会”。“‘五一’宣传口号定为：反对白色恐怖、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进攻苏联、拥护全国苏维埃、准备武装暴动建立农工兵苏维埃。”决议还明确指出：“对于这一路线怀疑与动摇的同志并须特别注意与之谈话批评，倘仍不接受当不犹豫的予以纪律的裁判，因为只有坚决与右倾斗争才能执行中央所揭示的正确路线”。这个决议把“左”倾盲动主义完全合法化，使之成为满洲省委从事对敌斗争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见附件2）

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注1）召开了旨在反对苏联的“追悼抗俄将士大会”。对此，我们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通过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组织群众，在追悼会会场外面召开群众会议。因为来人太少，会议开不起来。当时“左”倾领导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

决定将少数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带进会场。当会议主席在台上呼喊“烈士精神不死，中华民族万岁！万万岁！”时，与会的反帝大同盟成员在台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外交协会！”会场主席见此情况也不示弱，大喊“打倒赤色帝国主义！”反帝大同盟成员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场内两派宣传甚为激烈，群情沸然。（见附件3、4）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二日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举行国民常识讲演会议，请留美归来的苏上达介绍“泛太平洋会议”的情况。满洲省委通过在国民外交协会当秘书的地下党员郭庆芳（当时叫郭任民）得到几十张入场券，派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廷和赵尚志、陈尚哲等人出席会议。预先计划由赵尚志登台讲演，其余参加会的人呼喊口号，鼓掌助威。

这次会议由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委员、辽宁商会副会长卢广绩主持。会上，卢广绩作了简单介绍之后，请苏上达讲演。正当此时，赵尚志挺身站在听众席第一排的长凳中间，面向群众进行讲演。他沉痛地向听众报告英、日帝国主义最近在上海惨杀工人、学生的罪行，揭露帝国主义的

残暴，激起了到会者的愤慨，台下广大群众报以热烈掌声。一时间会场秩序大乱，满洲省委预先安排好的人趁此机会从楼上往下散发题为《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传单，斥责国民外交协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署名为反帝大同盟。继而赵尚志带头呼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外交协会！”此时听众对“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口号十分愕然，只有反帝大同盟参加会议的人跟着呼喊，大多数人则默不作声，这样持续达半个小时左右。会议主席卢广绩赶紧上台解释：“大家对这个会有什么意见，会后我们可以谈谈，现在请大家安静下来，先开会。”但在此时，国民外交协会的招待员已去报告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陈兴亚命令侦缉处长雷恒成带人到会场内严密监视群众，对喊口号的人查问姓名、住址。这一切事情外交协会秘书郭任民看得很清楚，他不时地给赵尚志递眼色，赵尚志未发现；郭任民也未采取应急措施。散会时，宪兵、侦探将赵尚志、杜兰廷、陈尚哲三人挤到群众后面，捆绑起来，押送到宪兵司令部。（见附件4、5、6、7、8、9）

在敌人法庭审讯过程中，赵尚志表现非常坚定。他义正辞严地阐述反帝的必要性，并面斥敌人，使法官无话可

答。敌人恼羞成怒，用严刑逼供；赵尚志同志，据理相争，顽强不屈，被敌人视为难对付的“滚刀肉”。

敌人对赵尚志没办法，遂紧逼杜兰廷、陈尚哲。这两个人开始失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但他们经不起严刑，第三天晚上即招供叛变；供出了满洲省委和团省委的领导人和机关。侦缉处长雷恒成从杜兰廷家中搜出“五一工作计划”等文件。杜兰廷带领敌人到处捕捉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见附件3、5、9）

二、破坏的经过

四月十二日国民外交协会会场捕人事件，并没有引起满洲省委和团省委的足够重视，党的秘密机关没有及时转移。事隔五天后，反帝大同盟机关遭到破坏，反帝传单被敌人搜去；团省委及开会地点也出现了侦探；基督教青年会被搜；地下党员宋小坡在交通处被捕。四月十八日，平旦中学被搜捕去反帝教职员四人（其中党员二人），其他学校内反帝青年亦有被捕。（见附件4、10）

四月十八日，满洲省委和团省委在团省委的秘密机关陶震邦家里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讨论“红五月”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参加会议的有李子芬、邱九、饶漱石、孙坤

(王文德)、丁君羊等人。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两点钟休会。为了第二天继续开会方便，李子芬、邱九、饶漱石等人遂宿于陶家，丁君羊到附近一位同乡家去借宿。(见附件。4、9、10)

团省委机关陶震邦的家是杜兰廷所知道的，杜已经向敌人供出。四月十九日早六点钟左右，有十多个便衣侦探和四、五个武装警察将陶震邦的家围住，然后上前敲门。看房子的女同志听到叫门声，没去喊醒在房间里睡觉的开会人员，便走出去开门；便衣和警察一窝蜂地闯进屋里，将睡觉的人全部捆绑起来。饶漱石以为女人不会被带走，遂对看房子的女同志说：“我走后你不必挂念。没吃饭，快烧饭吃，并且替我报个信到家里去。”但是，敌人把这位女同志也一起带走了。早晨七点多钟，敌人又将女同志押回住处，令其同侦探和警察一起等待前来接头的人。(见附件4、9、10)

早晨，丁君羊通知刘若云(满洲省委秘书长、化名李玉山)去机关开会。八点钟左右，刘若云来到陶震邦家，未发现什么不安全的信号，上前敲门，待开门后发现是陌生人，刘若云灵机一动，转口说：“这里有房子出租吗？”敌人狡黠地说：“你进来吧。”刘若云遂被捕。在

敌人捆绑刘若云的时候，看房子的女同志才把原来藏在锅底下的传单烧掉，抱着孩子从后门溜走了。（见附件1、10）

（1）九点多钟，丁君羊去参加会议。当走到陶震邦家附近时，看到陶家有扇门没关，就在门前来回徘徊。通过开着的门向里观察，看到院子里有个卖面茶的，于是径直走了进去。突然发现有个警察端着碗蹲在那里喝面茶，于是掉头就跑；两个警察紧追不舍，没跑多远，就被敌人抓住了。（见附件3）

郭任民在四月十二日国民外交协会例会之后，接到满洲省委的指示，省委要求所有的党、团员，都要给商会副会长卢广绩写恫吓信，每人至少十封，斥责他是策划捕人的罪魁祸首，逼迫卢广绩设法放人。郭任民用不同中学的信封，写了十多封匿名恫吓信，寄给了卢广绩。卢广绩核对笔迹，发现这些信都是出自郭任民之手，遂将郭任民的秘书职务辞掉。二十三日早六时许，陈尚哲带领宪兵逮捕了郭任民。同日，绿野书店经理刘丹岩亦被捕。二十九日东北宪兵第一大队长杨洪基带领宪兵、巡警，在大东边门外永安街兵工厂宿舍捕去刘文治等五人，在第二工科、兴权学校捕去二人，女同泽学校捕去教员一人。由于杜兰

廷、陈尚哲叛变投敌，并亲自带人搜捕，致使满洲省委和团省委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机关遭到破坏，一批文件被搜去。随之，敌人军警、侦探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约三十余人。(见附件5、6、12、13、14)

这次大逮捕，也波及到哈尔滨、抚顺等地。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发给哈尔滨电报指出：“辽宁省城，近日破获共党机关，拘捕要犯多人，共搜得文件多种，秘密阴谋，大半败露，刻在严密审讯中。据此次所获文证，该党在哈组织有市委支部，市委员孟某，住址不详。张某住道里四道街中华医院院内。为其所操纵之团体，有反帝同盟会，各工厂工会，学生会等。……哈埠极关重要，务仰严饬地方军警特别注意，侦察拿缉，以遏乱源。”这期间，哈尔滨军警逮捕了哈一中教员周一粟、戴洪洲以及黄某等五人，解往沈阳，交军法处审讯。满洲省委将此情况及时汇报给中央：哈尔滨统治当局“对于工人学生的压迫与防范，更为严重而周密，侦探四处结队，巡街的警察不绝于途。对各工厂学校当局有严重的指示，尤其是对反帝大同盟会员不独监视其行动，并且备有完全的名单通知各处”。抚顺在此期间亦有三十多人被捕。满洲省委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给中央报告说：

“自四月九日至五月五日，在奉天、哈尔滨、抚顺等地同志及革命群众被捕者成群打伙，凡数批。”（见附件：4、9、12、15、16、18、30）

三、省委的恢复

满洲省委和团省委主要负责人被捕、机关遭到大破坏，致使在沈阳的省委委员只剩王永庆一人，地下党活动完全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派驻沈阳的特科人员张麻子（邵一纯）（另说是邹麻子蔡伯强），立即将满洲省委被破坏的情况报告给党中央。中央对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十分重视，决定让正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廖如愿火速返回沈阳，恢复东北党的组织。（见附件19、32）

廖如愿回沈之前，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四日由省委委员王永庆和杨一辰、郭隆贞、徐克峻、宋奇等五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惟不发通告，重要事情仅发通知。临时委员会及时派宋奇到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省委破坏情况。廖如愿四月二十八日回到沈阳，五月一日与同志接上头，并决定翌日下午召开会议：解决有关组织和救济工作等问题；分析这次省委遭受破坏的教训，镇定同志们的情绪。鉴于以前的教训，会址决定改在

室外，定在沈阳小南边门外一个偏僻之处。应参加会议者八人：廖如愿、王永庆、宋奇、郭隆真、杨一辰、王和淑（王鹤寿）、潘×、徐克峻。其中，杨一辰、徐克峻因故未到会。会上，廖如愿宣布撤销先前五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省委。省委人员有：王永庆、唐宏经、林育英、廖如愿、王和淑。林育英为书记兼宣传工作、王永庆为职运书记、廖如愿为秘书长兼组织工作。郭隆真调中央另派工作；杨一辰负责辽宁工总并兼抚顺工作。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郭隆真同志讲几句话。恰在此时，一过路人前来问路，大家指明他要去的方向，此人离去。郭隆真讲完话正准备散会时，“问路人”带着沈阳公安局大批马队赶到，将开会的人团团围起来进行搜查，然后盘问每个人的姓名、住所、职业及彼此间的关系等等。郭隆真见此情景，不待大家答话，自己挺身而出，否认这是开会，说自己受丈夫虐待驱逐，精神昏沉，特到七圣祠消遣，遇表兄王永庆，遂向他长叙苦状，以求帮助。王永庆随机应变，马上接茬说：“我想她没有依靠，打算与我的朋友潘某说媒，我再帮潘某几个钱让他们成婚。”敌人听后，不由分说将郭隆真打了几鞭子，并将六个人全部捕去。幸好在押送途中大家得以沟通口供，过堂时，一致咬定郭隆真是青

岛的妓女，后来从良作妾，经不得大老婆的虐待，现经王永庆说合，愿意与潘某为妻。经过法庭上几番纠缠，又花费了二百多元钱买通关节，五月六日六个人全部取保释放。

(见附件 4、9、10、19)

五月七日，林仲丹（林育英）从哈尔滨返回沈阳，组建了新的满洲省委：书记林仲丹、组织部长杨一辰、宣传部长刘昆（赵毅敏）、秘书长廖如愿、团省委书记王鹤寿。新省委成立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抓紧恢复各级党组织和营救狱中同志。（见附件 4）

四、狱中的斗争

反动当局在奉天共搜捕了三十多人，经审讯，分批释放了一些人，最后被关押的剩下十九人。他们是：

李子芬（刘树清）满洲省委书记

宋振华（饶漱石）团省委书记

李禄森（丁君羊）省委组织部长

刘若云（李玉山）省委秘书长

邱旭明（邱九）中央巡视员

王文德（孙坤）脱产团干部

王笑山 脱产团干部

王心斋 沈海铁路局课长
赵尚志 脱产
宋小坡 国民大德生药房经理
郭任民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秘书

(以上均为党员)

王嵩山 第一师范学生
方景清 第一师范学生
吕凤祥 第二中学学生
刘仲武 某中学学生
张梦影 兵工厂枪厂工匠
魏学武 东兴纱厂工人
商振铎 兵工厂枪厂工人

(以上均为团员)

刘丹岩 (刘桂成)，绿野书店经理，此人是群众。

被捕同志很快发现这次省委遭受破坏是由于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廷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结果。省委书记李子芬和邱九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全体被捕人员要沉着冷静，在敌人法庭上只谈自己不谈别人，绝口否认认识杜兰廷。由于大家坚持了这条原则，使案情得到稳定而未继续扩大。(见附件 1、5)

被捕的十九人先被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侦辑处，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转押至辽宁第一监狱（即不久后分出独立的沈阳地方法院看守所）。被捕同志在狱中组成了以李子芬、饶漱石、丁君羊、刘若云、邱旭明为委员的狱中党支部。李子芬、饶漱石分任正、副书记，领导同志们在狱中进行斗争。（见附件 1、5、10、20）

在被捕人员中，敌人将李子芬、邱九、饶漱石、丁君羊、刘若云等七人列为重点，进行秘密审讯；其中，又将丁君羊、饶漱石定为首要人物。想从丁君羊口中得到地下党的一切关系，从饶漱石口中得到共青团的一切机密。对此案，东北当局十分重视，特由三机关（宪兵司令部、高等法院、侦辑处）联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会审，并指定宪兵司令陈兴亚、军法处长颜文海为“定罪专员”。敌人在审讯丁君羊时，指出他就是山东来的丁君羊。丁君羊一口咬定自己叫李禄森，根本不认识丁君羊。反动当局派人去山东进行调查，证实李禄森就是丁君羊，是山东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因为敌人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两个敢于当面对质的叛徒作证，并搜到了丁君羊在山东活动的照片。在这种情况下，丁君羊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他找来看守说：“我就是山东来的丁君羊，你可以去报告，你们要怎么办就

怎么办吧。”敌人得此口供，如获至宝，在报纸上公开宣称“丁君羊是中国共产党中有力人物”。被捕的十九人在狱中虽然受尽酷刑的折磨，但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坚强。除丁君羊外，没有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更没有吐露出党的秘密，敌人始终未得到什么真凭实据。（见附件3、9、10、21、22、23）

在第一监狱里，被捕同志一直被关在青年监里。敌人请来教诲师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因果报应；要被押人相信他的说教，与政府合作，不再搞不利政府的活动。赵尚志带头和他辩论，教诲师被驳得理屈辞穷。监狱只得允许这些人不再去教诲室听讲。到端阳节的时候，狱中支部领导大家为改善伙食进行斗争。由于行动一致，又取得了胜利。狱中斗争，使敌人恼羞成怒，他们将反抗最激烈的三个人送到关押强盗和烟犯的恶劣监房。三位同志进行了两天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把他们送回了青年监。

（见附件1、5）

这些斗争的胜利，使被捕的同志赢得了在狱中的一些方便：有病不再到病号监房受磨难；可以看报纸；可以购买食物等。狱中支部及时地将监狱中情况向省委和中央汇报，以便组织上设法营救被捕同志。（见附件1、5、21）